

·调查与思考·

实际生育二孩人群分析*

——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陈蓉 顾宝昌

【摘要】文章基于2017年针对已生育二孩的上海户籍夫妇的问卷调查数据,并与其他相关调查进行比较,对生育政策调整以来实际生育二孩的人群及其生育原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几年上海市生育二孩的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女性;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均较高,有祖辈帮忙照料孩子,女方不在业或工作灵活度较高、强度较低,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妇更有可能生育二孩。拥有相对充足育儿资源的家庭更可能生育第二个孩子,以满足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文章认为,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有针对性地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是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超低生育率 二孩生育行为 生育成本 情感效用

【作者】陈蓉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顾宝昌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典型的处于超低生育水平的特大型城市。1950~1970年,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5.6下降至2.28,1971年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朱国宏,1995),标志着上海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至今已有近50年。1971~1993年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2.1~1.0之间(1980年为0.87),1994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低于1,其中,2003年仅为0.64,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杨菊华等,2008)。2004年上海市取消了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须间隔4年”的规定,随后,与全国同步陆续实行“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在2012年(1.07)、2014年(1.14)、2016年(1.10)、2017年(1.00)达到或超过1,二孩占比从2004年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大城市居民婚姻行为的新特征、成因、影响及趋势研究”(编号:19CRK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8%上升至2017年的32.5%,二孩生育数量从2004年的0.23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3.83万人。2019年二孩占比降至28.76%,二孩生育数降至2.65万人。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至2019年末,出生人口近三成是二孩。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放宽,上海市生育二孩的家庭逐渐增多。一些学者基于调查数据对上海市二孩生育行为进行分析。彭希哲等(2015)根据上海市2014年再生育申请数据,描述单独再生育申请群体的户籍、受教育程度及第一个子女性别等特征,预测单独夫妇生育二孩的规模,但再生育申请者与实际二孩生育者存在一定的差异^①,且2014年的再生育申请者中尚未囊括双非独夫妻。周海旺、高慧(2019)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上海市户籍和非户籍生育二孩的女性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特征,但该调查中上海市户籍、生育二孩的女性样本量仅为164人,且受访女性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年龄跨度较大,由于样本规模较小且特征分散,其代表性和说服力不足。Shen等(2020)基于对21位已生育二孩、年龄在30~39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家庭年收入20万~200万的职业女性进行个案访谈,探究受访女性生育二孩的深层次动机。该研究的受访者均为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难以代表一般生育二孩女性的特征。可见,已有对上海市二孩生育行为的调查与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另外,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未生育二孩的人群,对已生育二孩的人群缺少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上海市户籍夫妇的问卷调查及其他相关调查数据,分析近年来上海市生育二孩夫妇的人口、社会与经济特征,探究其生育动机,以及家庭生育行为的新变化,为制定支持家庭生育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主要采用笔者自行设计和组织开展的“上海市两孩家庭生育养育状况及需求调查”数据,该抽样调查于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陆续在上海市的6个区展开(以下简称为2017年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为了尽可能地确保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第一阶段选择区位、发展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大的6个区,包括2个中心城区(静安区和徐汇区)、1个半中心区半郊区(浦东新区)、2个近郊区(闵行区和嘉定区)、1个远郊区(金山区);第二阶段抽取6个区内发展程度、人员构成等差异较大的街道作为调查样本点;第三阶段由街镇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根据调查对象要求选择受访者,使受访者尽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居委会。最终各区合格的调查样本分别为:嘉定区516份,浦东新

^① 根据原上海市卫计委的统计,2008~2012年再生育申请量为15 627例,实际生育数量为7 981人,占申请量的51%。这意味着即使在政策允许、条件符合、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否发生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区 607 份,闵行区 655 份,金山区 304 份,静安区 301 份,徐汇区 300 份,合计 2 683 份。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育二孩家庭的特征、生育动机和养育成本等。

考虑到样本量有限且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为防止受访人群过于分散,调查对象限定为夫妻双方均为初婚、已有两个孩子且第二个孩子尚未到入园的年龄、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是上海市户籍。对第二个孩子的年龄进行设定出于两点考虑:(1)绝大多数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时间在 2017 年 9 月之后(个别对象在 2017 年 8 月接受调查),如在调查时点第二个孩子未入园,那么第二个孩子应是出生于 2014 年 9 月之后,与“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时间较为接近,可以反映“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后的二孩生育情况;(2)0~3 岁未入园的孩子主要由家庭照料,家庭面临的养育困难更大。

表 1 个体样本的特征

项 目	受访妻子本人		受访者的丈夫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年龄(岁)				
20~24	4	0.15	0	0.00
25~29	331	12.36	169	6.30
30~34	1190	44.44	947	35.32
35~39	1009	37.68	1129	42.11
40~44	136	5.08	360	13.43
45 岁及以上	8	0.30	76	2.83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75	2.80	43	1.61
高中或中专	250	9.35	285	10.66
大专或高职	735	27.49	609	22.77
大学本科	1376	51.46	1351	50.5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38	8.90	386	14.44
职业构成				
未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308	11.51	30	1.12
农林牧副业	8	0.30	18	0.67
机关或事业单位	542	20.25	393	14.69
国有或集体企业	378	14.13	608	22.72
私营或外资企业	853	31.88	1107	41.37
个体经营或自由职业者	258	9.64	340	12.71
其他	329	12.29	180	6.73
独生属性				
独生子女	1967	74.09	1891	71.28
非独生子女	688	25.91	762	28.72

从样本特征看,97.7%的受访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 2014 年以后,受访女性本人及其丈夫的年龄均集中于 30~39 岁、七成多是独生子女,近九成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丈夫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工作的比例高于妻子、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低于妻子(见表 1)。“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双非夫妇”占比,以及调查前一年家庭税后收入情况如表 2 所示。

2013 年 11 月,原上海市卫计委为了做好生育政策调整的应对准备,开展了“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状况调查”(以下简称 2013 年调查)。调查对象为 20~49 周岁、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为上海市户籍的已婚育龄人群^①;每个家庭抽取夫妇中的一方,抽样时男女各占 50%;调查样本量为 8 500 人(陈

① 虽然调查对象包括初婚和再婚者,但再婚者占比仅为 3.35%。

建平等,2014)。本文将该调查结果视为生育政策调整前一般已婚户籍育龄夫妇的情况,对比 2013 和 2017 年两次调查的结果,可以反映二孩家庭与一般家庭的差异,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具备什么社会经济特征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二孩。

三、上海市生育二孩家庭的基本特征及生育动机

(一) 女性年龄构成及夫妇独生属性

年龄是女性能否顺利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基本条件。2017 年调查显示,从 2014 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至调查时点,上海市生育二孩的女性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年龄集中在 30~39 岁(见表 1)。其中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出生的女性在政策调整时已 35 岁左右,由于即将错过适宜生育的年龄,政策一旦放宽,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更有可能抓紧时间付诸行动。上海市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严格,且农业户口占比低,70 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群(2014 年年龄在 35 岁以内)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2014 年“单独两孩”政策调整时,“单独夫妇”是目标人群,直至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双非夫妇”才成为目标人群,但与“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相比,“双非夫妇”年龄往往偏大,大部分已经度过生育期。在接受调查的二孩夫妇中,只有极少部分(12.16%)是“双非夫妇”。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未来 10 年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规模将进一步减少。在育龄妇女人数,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的形势下,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成为缓和出生人数下行趋势的必然选择。

表 2 夫妻匹配样本的特征及家庭收入

项 目	频数	百分比
独生属性		
双独	1512	57.47
单独	799	30.37
双非	320	12.16
家庭税后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	367	13.71
10 万~15 万元	588	21.97
15 万~20 万元	628	23.47
20 万~30 万元	606	22.65
30 万~50 万元	355	13.27
50 万元以上	132	4.93

(二) 夫妻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

在高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发生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尤其是妻子受教育程度提高对促进生育率下降具有重要作用(郑真真,2019)。在超低生育水平阶段,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生育行为有何差异? 表 3 给出了 2017 年调查中受访生育二孩夫妻和 2013 年调查中受访一般育龄夫妻的受教育程度。从中可以看出,受访生育二孩夫妻中,六成以上的妻子和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及以上,且丈夫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重(14.44%)高于妻子(8.90%)。与 2013 年调查相比,2017 年调查中丈夫和妻子为大学本科学历者的比重明显偏高,且丈夫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比重几乎高 1 倍^①,

① 2013 与 2017 年两次调查相对照,可能会受到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但两次调查的受访者均为已婚人群,其文化程度发生变动的可能性较小。

表3 生育二孩夫妻与一般夫妻的受教育程度 %

受教育程度	2017 年		2013 年	
	受访妻子	受访者的丈夫	受访育龄人群	受访育龄人群的配偶
初中及以下	2.80	1.61	3.67	4.71
高中或中专	9.35	10.66	15.18	14.67
大专或高职	27.49	22.77	29.67	28.60
大学本科	51.46	50.52	42.75	44.2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8.90	14.44	8.74	7.79

反映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有可能生育二孩,且丈夫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

家庭经济收入对生育安排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17 年调查发现,生育二孩

的家庭(由受访者、配偶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中,家庭税后总收入在 20 万以上的占 40.84%(见表 1),而在 2013 年调查中仅占全部受访者的 11.51%(陈建平等,2014)。当然,随时间推移收入可能会增长,但 2017 年调查中家庭税后收入 30 万以上者的占比(18.2%)仍高于 2013 年调查中 20 万以上者的占比。因而,两次调查相比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两个孩子。另外,大部分生育二孩家庭不仅总收入高,而且以丈夫收入为主。2017 年调查显示,受访生育二孩家庭收入来源中,以丈夫收入为最主要来源的高达 86.99%,妻子收入为最主要来源的仅占 7.74%,以其他收入为最主要来源的只有 5.27%。可见,大部分二孩家庭可以接受妻子因生育可能造成的收入损失。

由于上海市生活成本和育儿支出费用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往往收入较高,如本科及以上的被访者家庭年收入 20 万及以上的占比明显高于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者^①(见表 4)。高收入家庭不仅受育儿经济支出的约束小,而且更有能力以家庭为单位整体评估育儿成本,尽可能减少因生育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更有能力生育二孩。

与生育转变阶段相比,低生育时期女性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高生育水平时代的许多规律不一定适用于超低生育水平阶段,不可盲目用传统的生育理论来认识低生育率下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表4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家庭税后年收入在 20 万以上的占比 %

受教育程度	受访妻子	受访者的丈夫
初中及以下	10.67	4.76
高中或中专	12.45	13.64
大专或高职	29.60	24.38
大学本科	47.42	46.3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76.79	71.58

(三) 夫妻的就业状况及子女照料安排

照料孩子是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因而家庭的养育能力不仅需要考虑经济资源,还要考虑孩子(尤其是婴幼儿期)的照料资源。生育和抚养子女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且多以女性付出为主,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促进高生育率下降的另

① 调查时为了方便受访者,家庭税后年收入给出的是区间选择,不是填写数值,因此只能与受教育程度进行交叉分析。

一个重要因素(郑真真,2019)。那么,在上海这样一个竞争极强、双职工家庭普遍的城市,生育二孩夫妇的就业状况及工作强度如何,与一般家庭有何不同?2017年调查显示,生育二孩家庭的妻子未从事有收入的工作的比重为11.51%,明显高于丈夫(1.12%)。而2013年的调查显示,20~49岁人群中不在业或失业者的比重为7.8%(陈建平,2014)。对比两次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生育二孩家庭的妻子不在业的可能性更高,丈夫不在业的可能性更低。

表5给出了生育两孩的双职工家庭中妻子和丈夫的工作时间安排,主要反映工作的灵活度和强度。从中可以看出,近四成的妻子工作时间8小时以外不需要加班,14.51%的妻子上班时间比较灵活或完全由自己掌握,仅6.36%的妻子经常需要加班,而18.66%的丈夫经常需要加班。可见,生育二孩家庭的女方更可能是全职母亲,或者女方的工作灵活度较高、强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妻子比丈夫花在照料和陪伴子女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尤其是在新生儿期和哺乳期,丈夫参与照料对妻子的替代性不高。

尽管生育两个孩子的女性不在业的可能性高于其丈夫,也可能高于一般已婚女性,但其就业率仍高达88.49%,那么这些家庭是如何安排子女日常照料的?2017年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最近3个月的工作日,两个孩子白天不在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时主要由谁看护。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两个孩子目前处于哪个阶段,祖辈参与都非常重要,其次是母亲亲自照料。可见,家里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已成为生育二孩的重要支持因素。这也印证了上海开展的许多生育意愿调查所发现的,不打算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抚养两个孩子、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如果父母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即使年轻夫妇有生二孩的愿望,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江苏六县(市)的追踪调查也表明,那些有意愿生育二孩且最后确实生育了二孩的家庭,其共同特点是有长辈帮助照料孩子(郑真真,2011)。

在中国,祖父母对孙子女的隔代照料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血脉传承的传统思想,使祖辈十分重视自己对孙辈的责任;另一方面,家庭内部代际间也存在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关系,祖辈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孙辈,促使其未来给予自己晚年赡养。因而,隔代照料既是符合传统思想的一种责任内化,也是适合国情的一种照料方式。当前中国0~3岁托育服务社会供给严重不足,即使在上海,社会化的托育服务供给

表5 生育二孩双职工家庭中妻子和丈夫的工作时间安排

工作时间安排	受访妻子		受访者的丈夫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工作日固定8小时				
不加班	928	39.37	593	22.53
有时需要加班	937	39.75	1129	42.90
经常需要加班	150	6.36	491	18.66
上班时间相对灵活	199	8.44	280	10.64
上班时间由自己掌握	143	6.07	139	5.28
合 计	2357	100.00	2632	100.00

表 6 生育二孩家庭中两个孩子的看护情况

看护情况	一孩				二孩			
	入托(园、学)		未入托		入托		未入托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看护人								
母亲	568	22.88	51	24.17	51	24.76	720	29.19
父亲	52	2.10	7	3.32	6	2.91	17	0.69
祖父母	1455	58.62	141	66.82	129	62.62	1599	64.82
其他人	58	2.34	12	5.69	20	9.71	131	5.31
寄宿或晚托	75	3.02	0	0.00	0	0.00	0	0.00
孩子自理	274	11.04	0	0.00	0	0.00	0	0.00
合 计	2482	100.00	211	100.00	206	100.00	2467	100.00

也不能满足需求。2017 年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愿意送 0~3 岁子女入托,但受访者的 0~3 岁学龄前子女,实际入托率仅为 7.49%,其中进入公办托儿所的仅占 56.62%。

瑞典通常被认为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 70%的已育妇女在工作,相比之下上海生育二孩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瑞典已育女性的高就业率与其托育机构的全面覆盖密不可分,而上海市 0~3 岁婴幼儿入托比例远低于瑞典,大量的照料任务由祖辈承担。如果祖辈主观上不愿意或者客观上健康状况不再允许帮助年轻夫妇照料孩子,势必会削弱夫妇的再生育意愿,或者迫使夫妇一方(主要是女方)放弃工作。

(四) 生育动机分析:生育二孩的成本—效用分析

上海是全国生育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生育成本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刚性约束,尤其是在当前育儿精细化、教育等投入高的形势下,群体的生育水平比全国低很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上海市出现了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生育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导致人们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

1. 养育两个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一,父母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较多。2017 年调查显示,92.99%的家庭第一个孩子已入托、入园或入学,92.72%的家庭第二个孩子尚未入托;74.78%的第一个孩子和 16.81%的第二个孩子参加教育辅导或兴趣班等,且绝大多数学习辅导由父母承担。45.32%的受访妻子、18.96%的丈夫平均每天用于陪伴和照料孩子及带孩子上兴趣班或课外辅导班、给孩子辅导功课等的时间大于 4 小时。陪伴和辅导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两个孩子的父母,尤其是双职工父母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其二,父母自我发展受到影响。2017 年调查询问了养育两个孩子对受访妻子及其丈夫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结果显示,养育两个孩子使 63.16%的妻子和 47.89%的丈夫社交活动时间减少,40.97%的妻子和 19.81%的丈夫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30.27%的妻子和 13.15%的丈夫为了兼顾孩子改变了原有的职业规划,还有 15.07%

的妻子为了照顾孩子选择辞职在家。可见,养育两个孩子给部分父母的事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且对母亲的自我发展限制更大(见表7)。

2. 养育两个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

其一,育儿基本成本虽高但尚可承

表 7 养育两个孩子对夫妻双方的工作事业发展的影响

	受访妻子		受访者的丈夫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为了照顾孩子选择辞职在家	358	15.07	44	1.85
为了兼顾孩子改变了原有的职业规划	719	30.27	312	13.15
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	973	40.97	470	19.81
工作晋升机会变小	479	20.17	170	7.17
工作收入减少	337	14.19	98	4.13
社交活动时间减少	1500	63.16	1136	47.89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工作更加努力	606	25.52	1212	51.10
工作收入增加	55	2.32	238	10.03
没有影响	213	8.97	515	21.71
其他影响	9	0.38	7	0.30
样本量	2375		2372	

受。2017 年调查显示,81.82%的家庭上一年度全年育儿总支出在 2 万元以上,平均占家庭总支出的三成以上。这些经济支出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生活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及保险等支出、旅游娱乐支出和其他育儿支出。就家庭对这 5 项基本育儿支出的承受能力看,21.93%的受访者表示完全可以承受,55.40%的受访者表示有一些压力,基本上可以承受,19.94%的受访者表示有很大的压力,难以承受,仅有个别(0.22%)受访者回答完全无法承受。总体来看,育儿基本支出成本虽高但可以承受。这一方面反映出生育二孩家庭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绝大部分家庭做出生育二孩的决策是理性的。

其二,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和购买学区房或许是更大的压力来源。近年来,媒体报道中常常用“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房子和孩子只能选一个”来解释上海市居民的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水平。2017 年调查询问了生育二孩家庭的购房或置换房子的计划,713 个(26.73%)家庭近期有购买或置换房子的计划。其中,709 个家庭表示,由于现有住房的居住空间不够、需要更大的房子(66.57%),需要为子女入学购买学区房(19.04%),想给子女多留一些资产(4.51%)。因此,购买或置换房子或许是更大的经济压力来源。

2017 年调查还显示,生育二孩家庭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占 52.22%,略高于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比重(47.78%)。这说明一孩是女孩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二孩。从个案访谈看,这并不是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导致的性别偏好,而是因为如果一孩是女孩,无论二孩是男还是女,都是非常好的子女性别构成;但如果一孩是男孩,再生一个男孩,就要考虑“置办两套婚房、娶两个儿媳妇”,这样经济压力会非常大,使一孩是男孩的家庭担心再生育一个男孩而不敢生二孩。

3. 生育两个孩子的效用

在经典家庭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其从生育中能够(或预期能够)

获得的收益与需要(或预期需要)支付的成本之间的权衡。2017年调查详细询问了受访者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在表8所示11个原因中按重要性选择3项。在汇总数据时,本文首先按排序第一到第三位分别赋值3、2、1分,然后再计算11项主要原因的总得分,最后对生育二孩原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结果显示,两个孩子可以互相依靠、喜欢家里有两个孩子、减轻子女养老压力等是最主要的原因。这说明,这些家庭之所以生育二孩更多是从有益于孩子成长、为孩子着想做出的决定。孩子的经济效用、保障效用和延续后代的效应均在弱化,夫妇生育的动因已从功利性需求转向情感性需求。

表8 生育二孩的动机分析

生育二孩的原因	第一	第二	第三	得分	排序
两个孩子可以互相依靠	821	522	188	3695	1
喜欢家里有两个孩子	213	291	291	1512	2
减轻子女养老压力	70	389	365	1353	3
独生子女风险较大	268	126	175	1231	4
想再要一个儿子或女儿	105	118	200	751	5
长辈希望再生一个	78	142	207	725	6
意外怀孕	128	18	86	506	7
加深夫妻感情	12	49	81	215	8
身边很多人都想生或已生二孩	7	42	81	186	9
继承家业	0	4	12	20	10
其他原因	1	0	12	15	11

尽管生育养育两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较高,但生育二孩的家庭更可能是收入比较高的家庭,也是可以获得较多祖辈照料支持的家庭。在家庭收入足够高和照料资源足

够的情况下,养育子女的经济支出和照料支持的约束就相对减小,甚至不存在;对子女在经济反哺和社会保障上的需求也相对减少或不需,这些家庭可以更多地从孩子的情感效用出发,付诸生育行动,满足生育需求。从成本效用分析看,两孩家庭做出再生育决策时不可谓不理性,只有当家庭育儿资源可以弥补、抵消、甚至忽略因生育第二个孩子带来的机会成本、经济成本和照料成本时,夫妇有能力突破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二者间取其一的限制,才会选择通过生育两个孩子达到孩子数量和质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上海为例,基于2017年开展的针对生育二孩夫妻的调查及2013年上海市相关调查数据,考察生育政策调整以来已经生育二孩的家庭的基本特征及生育动机,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近几年,上海市生育二孩的女性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存在因年龄偏大、在政策放开之后“抢时间生育”的现象;生育二孩的夫妻中“双非夫妇”的占比明显低于“单独夫妇”和“双独夫妇”。(2)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夫妇更有意愿和可能生育二孩。其中,丈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且是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大。(3)全职妻子或妻子工作灵活度较高、强度较低的

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二孩。上海生育二孩的女性就业率高达 88.49%,其背后是来自祖辈的非正式照料支持。(4)育儿基本经济支出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更大的压力来自置办房产及预期的支出;两孩家庭再生育的动机主要是满足对孩子的情感需求,而非经济 and 保障需求。(5)一孩是女孩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二孩。由此可见,在上海这样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特大城市中,具有相对充足的育儿资源的家庭更有可能生育第二孩子,并且这些家庭也会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尽可能减少因生育养育两个孩子带来的损失,满足对孩子的情感性需求。育儿资源不仅包括经济供养实力,还包括照料子女的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二者缺一不可。对于许多人来说,生育一个孩子是“必需品”,但再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奢侈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 0~3 岁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托育服务资源的可及性;(2)尝试通过政府补贴、社会公益捐助和家长低价缴费相结合的方式,为已入园或入学儿童提供社区儿童课后和寒暑假托管服务;(3)促进育龄人群、主要是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倡导和鼓励父亲承担更多的抚育子女的责任。此外,应宣传提倡新型的婚育文化,倡导适龄婚育。

本文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市户籍夫妇,未考察在沪常住的非户籍夫妇,而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对上海市户籍夫妇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时,未对户籍迁入上海的“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进行区分,这二者具备的育儿资源和生育观念也可能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参考文献:

1. 陈建平等(2014):《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状况调查》,《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第 8 期。
2. 彭希哲等(2015):《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
3. 杨菊华等(2008):《中国离极低生育率还有多远?》,《人口研究》,第 3 期。
4. 郑真真(2019):《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在生育转变中的作用——基于妇女地位、劳动参与和家庭角度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第 3 期。
5. 郑真真(2011):《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学海》,第 2 期。
6. 周海旺、高慧(2019):《上海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生育福利政策探讨》,载于杨雄、周海旺(主编):《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9)——关注民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朱国宏(1995):《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人口研究》,第 1 期。
8. Shen Y., Jiang L. (2020), Reproductive Choices of Highly Educated Employed Women with two Children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5):611-635.

(责任编辑:朱 犁)